

·庄严寺·

士礼居·过云楼·顾家花园

王 茜

2005年11月12日,趁开会报到后的空暇,我们一行五人到苏州寻访藏书楼旧址。

同行中清华大学图书馆刘蕾女士曾著文介绍过云楼藏书,故此与过云楼主人顾文彬五世孙顾笃璜先生曾经通信联系。我们来到事先约定的网师园附近沈德潜故居,顾笃璜先生已在这里等候我们多时了。顾先生今年七十八岁高龄,精神矍铄,双目炯炯有神,退休后一直积极促进昆曲抢救,主持着已有八十余年历史的“昆曲传习所”,活动地址就在沈德潜故居。关于近年昆曲演出,2004年12月23日《北京青年报》曾以“江南最后一个名士”为题做过长篇报道,可以参阅。

顾笃璜先生娓娓介绍过云楼藏书“文革”中辗转变迁,以及顾氏族人自抗战以来流离失散的状况。过云楼现在被一家房地产公司占用,已无顾家人居住其中;九十年代初南京图书馆收购过云楼藏书500余部,3000余册,内多善本,宋元刊本也占一定比例,其学术价值及文物价值仅次于丁氏八千卷楼藏书。可喜的是,近年苏州政府已经开始注意过云楼存在的历史文化意义,有意整饬开放藏书楼。中午时分,顾笃璜先生以苏州风味的包子和绿茶招待我们。在沈德潜故居,和过云楼后人共享苏州茶点,在我们心中留下的是隽永。

顾笃璜先生遂带领我们参观过云楼及怡园。过云楼及怡园旧址原为明代吴宽所有,清代同光年间被曾任道台的顾文彬购置,重新修建。由于城市建设,宅邸前半已成马路,现在临街处即是原来庭院深处的藏书楼。因是周六,房地产公司不上班,我们也就无缘进到院中登临过云楼。怡园本为过云楼私家花园,乃苏州众多园林之一,现已开放。内中多名名人如翁方纲、顾文彬、顾廷龙等题字,翁方纲嘉庆癸亥所题“石听琴室”,并非因怡园而作,系顾文彬后见翁氏题词切合庭园布置而摩写,并跋曰:“生公说法,顽石点头;少文抚琴,众山相应。琴固灵物,石亦非顽。儿子承于坡仙琴馆操缦学弄,庭中石丈有如伛偻老人,作俯首听琴状,殆不能言

而能听者耶?覃溪学士此额,情景宛合,先得我心者,急付手民,以榜我庐。光绪二年岁次丙子季冬之月怡园主人识。”室内古琴抚然,室外湖石嶙峋,表达主人雅趣且超然之情怀。

出得怡园,我们还想再去寻访黄丕烈的“士礼居”旧址。顾笃璜先生兴致勃勃,与我们同行。黄丕烈是清代最著名的藏书家之一,其藏书极重宋本,故有“百宋一廛”之说。国家图书馆所藏宋版书,其中部分曾经黄丕烈皮藏,其跋文及藏书印记曾数次揣摩。我们走在著名的玄妙观前街上,此地曾经书肆林立,旧刻名抄时出其间。道光年间黄丕烈本人也曾在此附近开设滂喜园书铺。如今街上丝绸服装店与菜馆鳞次栉比,适值周末,熙熙攘攘。穿过玄妙观前街,过一小河,便是悬桥巷,悬桥巷北是葭巷。士礼居的后门在葭巷,前门在悬桥巷。其旧址现为一丝绸服装厂,可辨认为士礼居旧屋仅一正厅和东侧小院而已。正厅雕花窗棂尚可见旧日气派,但今与一厨房紧邻,脏水在门前肆意流淌,正厅后面是钢管与塑料顶棚搭起的大棚,停放着自行车摩托车;东侧尚存一小院,院内三间平房,宝瓶形拱门尚完整,院墙上雕花窗洞也是当日风韵。顾笃璜先生认为都不是藏书楼,苏州藏书楼的格局基本一致,均为楼上藏书,楼下看书或接待朋友之所。尚存之正厅如同客厅,东侧之平房,当是女眷日常起居之所。无论如何,仅存遗址仍然让我们亲见了神往已久的黄丕烈故居。

葭巷旁边的小巷,即通往顾颉刚故居。我们欣然前趋。轻轻叩门之后,铁皮门打开,一对中年夫妇问明来意,热情将我们迎入。院落不大,屋舍高敞。南面一座已砌成墙的大门楣上刻有篆字“子翼孙谋”,语出《诗经》,为周贻白手迹。一位老者迎出,询问之下,竟是顾颉刚先生哲嗣,已是84岁高龄。原来这里仍是顾家后代居住。一位是顾颉刚后人顾德辉,一位是过云楼后人顾笃璜,此时坐在一起。二顾郡望不同,过云楼之顾乃徽州人氏,顾颉刚之顾乃昆山人氏。顾德辉先生给我们介绍顾家花园的变迁,曾经在这里居住过

的人物,比如白寿彝在大同书局做事时,曾住在这里。《文献》季刊曾于2002年刊出《顾颉刚藏书记》之文,该文详细记录了其藏书之聚散,多次提到苏州购书经历。此时笔者身处顾宅,想到苏州众多藏书家及其藏书之命运,感慨系之。悬桥巷内名人故居颇多,仅我们路过的就还有清代状元洪

钧故居、近代名医钱伯煊故居。

离开顾家花园,已是暮色苍茫。对我们这些热爱藏书研究的人来说,这一天探寻藏书楼的行程多么难忘。同行者还有:杜泽逊、主父志波、王锴。

·拂云楼·

书籍的文化与古旧书业的价值

武汉大学教授谢灼华先生谈荟

李雅笔 录

自从1983年图书发行专业设立,放到大学本科目录上,就一直有这样一个议论:图书发行专业是不是一个学科?卖书还有学问吗?这样的看法比较普遍。因为在此之前没有高等学校有这样一个学科,学科体系、研究内容、研究范围大家都不是很了解。随着专业的创办和发展,1983年创办到1987年招生,新华书店总店一直很支持,安排学生到长沙、南京、上海等地参加毕业实践,对知识水平、行业理解等方面发表自己的观点,可以看到书业研究的确包括很多方面。1956年,刘国钧教授就提出,国外学术界甚至可以对叶子进行研究,对昆虫进行研究,为什么图书馆管理就不能是一个专业呢?书籍能否成为一个研究对象,是不是学问,能不能占有一定地位?20世纪以来这已经不成为一个问题,但的确过了一系列长远的道路和摸索过程。但是,把书籍当作对象来研究,需要派生一系列研究课题,如对书稿进行编辑加工、装帧印刷后成为以物质为载体的精神产品,派生出以出版物为研究对象的编辑学;发行是一种渠道,书籍如何到读者手中,读者读什么,而图书馆则是对精神产品进行科学整理,使读者寻找方便,使用长久,从而使文化与知识得以传播和保存。科学的阅读、整理和保存书籍是图书馆读者服务很重要的方面。

作为一本书的作者和读者,两者关系看来很简单,而从社会文化学来看需要有一个中介,这个中介就是通过出版机构对手稿进行编辑、出版,通过发行渠道使书籍到读者和图书馆手上。研究所需书籍不可能只从作者或者出版社那里得

到,要使图书馆藏书更完整,需要依赖发行渠道。作者要通过发行渠道找到出版者,使作者的研究成果等形成著作,读者对作者作品发表后产生一定的反响,通过评论等手段形成新的作品。比如围绕《红楼梦》出现的《红楼增目》、《红楼衍目》等,某些绘画作品、雕塑作品和电视剧围绕某种书籍作品进行再创造,通过一定渠道又回到作者阅读范围内,形成一个“回路”。但凡一个出版物,如果不通过出版工作者的加工,是不完善、不完美和不准确的;而不通过发行渠道传播,那也是存在很多遗憾的,读者看不到,图书馆没有保存,就形成知识积累和知识传播的千年遗憾。由此可见,创作与编辑出版是作品流传的两个重要环节,发行也必不可少。这样看来,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徐雁,依据自己长期的积累,从事古旧书业研究这个课题,并撰著成书《中国旧书业百年》(科学出版社2005年5月版),它的意义就已经非常明显了。

从时代特征来看,20世纪,从中国近代历史来看是很值得注意的历史年代,是变革最激烈的,民族矛盾异常尖锐,文化设施更替频繁的年代。回顾历史,这些特征是很明显的,封建制度灭亡,建立新的社会制度,政权不断更替,战争频频发生。文化学术的根底,即“旧学”退出历史舞台,“新学”登上历史舞台。而“新学”的出现,当时表现在新旧文化的冲击,中西文化的碰撞和古新书籍的变化上;到当代则表现为传统与现代的更替,如信息高速公路、互联网的出现。